

这世界如此残酷，谢谢你陪我一起穿越黑暗。

世界上的另一个你。

修订版

[美] 朗·霍尔 (Ron Hall) 著 李佳纯 译
丹佛·摩尔 (Denver Moore)

Same Kind of
Different as Me



世界上的 另一个你。

修订版

Same Kind of
Different as Me

[美] 朗·霍尔 (Ron Hall) 著 李佳纯 译
丹佛·摩尔 (Denver Moore)


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/ (美)霍尔 (Hall, R.), (美)摩尔 (Moore, D.) 著; 李佳纯译. — 修订本.
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1
书名原文: Same Kind of Different as Me
ISBN 978-7-5404-7420-1

I. ①世… II. ①霍… ②摩… ③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091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1-560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外国文学

SAME KIND OF DIFFERENT AS ME

Copyright © Ron Hall and Denver Moor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Nelson,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Christian Publishing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omas Nelson, through The Artemis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(修订版)

作 者: [美] 朗·霍尔 (Ron Hall) 丹佛·摩尔 (Denver Moore)

译 者: 李佳纯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潘 良 马冬冬

特约编辑: 温雅卿

版权支持: 文赛峰 李彩萍

营销支持: 李 群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420-1

定 价: 3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全球媒体推荐

丹佛·摩尔和朗·霍尔的故事让我感动落泪，它让你体会到生命中各种面貌的爱，真的是一本好书！

——芭芭拉·布什，美国前第一夫人

这是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，关于悲剧、胜利、坚持、奉献、信念以及人性的坚忍不拔。黛博拉·霍尔坚定地奉献于帮助他人。她的离世让认识并爱她的人感觉生活中出现一个大洞。她对游民的服务，感动了成千上万人。这期间，她让两个社会地位天差地远的灵魂更接近。现在，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无数人。

——瑞德·史提戈尔，得州桂冠诗人

这故事是关于上帝的爱如何交织起两个男人的生活，启发并改变人心。朗·霍尔和丹佛·摩尔邀请你和他们走一段有关成长、痛苦与喜悦的旅程。一个人拥有世俗的成功，另一个人赤贫，通过一个善良女人的愿景与坚持而相会。他们的故事给我们一个信息，要活出自己，对别人的生活产生正

面的影响。

——卡罗尔·赖德，《魅力女人百分百》作者

这是我所读过最激励人心、最感人的故事，包括信念、坚忍与友谊。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愈疗、宽恕的力量，以及无条件的爱如何改变生命。很多人挂在嘴上，但很少人做到。毫无疑问，本书里的人做到了。

朗、丹佛、黛比，真诚谦卑并毫无保留地分享他们的故事，纵使有缺陷，还是会改变每一个读者。这个惊人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不忘爱的无限力量。

——马克·克雷门，《当幸福来敲门》制片人

这本书不只是一个回忆录，它更捕捉到可以改变我们社会的独特精神。如果一个人可以放下自己的需求和歧见，愿意诚心诚意关怀另一个人，那么，奇迹便会出现。借由书中两位主角，我们看见他们各自都成长了，也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面。很感谢朗与丹佛分享他们的故事，也希望这个故事可以启发更多人，让他们愿意以简单的一己之力，改变这个世界。

——李克·派瑞，得州州长

保罗使徒在写给歌林多的信上写道：“如今常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”

这本书说的正是关于黛博拉·霍尔的信仰、希望与爱，她相信上帝、希望世界更美好，她永恒不渝的爱永远地改变了两个男人的一生：一个是她的丈夫——朗，富有的国际艺术品交易商；另一个是丹佛·摩尔，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认为露宿街头可以让他的生活更上一层楼。

朗·霍尔与丹佛·摩尔以自己的话语叙述故事，让你的心弦随着叙述人

的不同而改变，一时温暖一时痛苦。这种独特的双作者风格，以诚恳坦率的方式，谱写出引人入胜而情感丰富的故事，让人体验生命的改变。

——迈克·蒙克里夫，沃思堡市市长

富豪与流浪汉，这两个生命几乎很难有交集的人，却奇妙地相遇了，并且，这样的相遇也改写了他们各自生命本来的基调——生命的质地事实上无关乎社会阶层的高低，但大部分人却还是迷惑，以至于执迷；无论是在世间的成就感中重复某种生活模式，或者是在失去盼望中自我放弃，都是活在一种框架中。

我们的人生或许没有富豪与流浪汉这般极端，但仔细想想，谁不是活在一种框架中呢？而这样的框架又该怎么样打破呢？

什么样的人该读这个故事？伤心的人、绝望的人，还有怀疑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伤心的人、为什么要有绝望的人，以及让别人伤心的人、让别人绝望的人。说到底，就是他，就是你，就是我……这不是一个故事，这是许多人生命旅程剖面的集合。

——彭蕙仙，作家



丹佛

哟——贫穷如我

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天堂……

有钱人一辈子过得好命

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地狱……

要在那万古磐石找个家才好，你还不懂吗？

——黑人灵歌

在认识黛比小姐之前，我从来没跟白种女人说过话。可能只回答过几个问题——算不上说话。对我而言，那风险已经够大了，因为我最后一次蠢到开口跟白种女人说话，不但差点被打死，还几乎瞎了眼。

那时我十五六岁，正走在我住的棉花庄园前面一条红土路上，那里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河郡。庄园又大又平坦，像一堆农田排在一起，然后有条支流从中间蜿蜒流过。丝柏树像蜘蛛一样蜷伏在水里，水是淡淡的苹果绿色。那片土地有许多不同的农田，每一块面积都是一两百英亩，边缘都种有阔叶树，大多是胡桃树。

但路边的树不多，所以那天我从姨婆家（她是我祖母的姐妹）走回来的时候，感觉很开阔。没多久，我看见一位白人小姐站在她的车子旁，一辆蓝色的福特，大概是1950或1951年份的车型。她戴帽子穿裙子，可能刚从城里回来。她望向我，一副想知道怎么修破胎的样子。所以我停下来。

“您需要帮助吗，女士？”

“是的，谢谢你。”她说。老实讲，她看起来心怀感激：“我真的需要。”

我问她有没有千斤顶，她说有。我们就讲这么多。

我把破胎修好之后，三个白人青年骑着枣红的马从林子里出来。我想他们是去打猎，他们骑马快步出现时没看见我，因为他们在路中间，而我低下身子在车子的另一边修理轮胎。马蹄扬起的红土围绕着我。一开始我没动，心想等他们离开再说。可是接着我决定站起来，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在躲。这时，其中一个人问那白人小姐需不需要帮忙。

“我看不需要！”一个红发、有着大颗牙齿的家伙看到我时这么说，“已经有黑鬼帮她了！”

另一个黑发、看起来有点狡猾的人，把一只手放在马鞍的鞍桥上，另一只手把帽子往后推。“小子，你干吗骚扰这位好小姐？”

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小子，大概十八九岁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看着他。

“你看什么看，小子？”他说，吐了一口口水到土里。

另外两个光是笑。白人小姐没说什么，只低头看她的鞋子。当场只听得见马打响鼻的声音，像龙卷风要来之前的黄色警戒。然后一个最靠近我的小子，拿出一条草绳绑在我脖子上，像绑小牛一样，用力扯紧，使得我无法呼吸。绞索刺入我的脖子，恐惧从我的腿爬上我的肚子。

我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，他们都不比我大多少。但他们的眼神冷漠又恶毒。

“给你一个教训，要你以后别再骚扰白人小姐。”拿绳子的那个人说。这就是那几个年轻人最后对我说的话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不想多讲，因为我不想要怜悯。那个年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就是这样，我想密西西比州也是。因为两年之后，有人跟我讲过一个叫艾密特·提尔的黑人被打到面目全非的事。

他对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，然后一些好人家的男孩——林子里好像充满这种人——也不喜欢这个黑人这么做。他们把他打到一只眼睛掉出来，然后在他脖子上绑了一台轧棉机，从桥上丢到塔拉哈奇河里。听说，直到今天，走过那座桥的时候还可以听见被淹死的年轻人从河里传出来的哭声。

像艾密特·提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只是大部分没有上报。有人说，在红河郡的海湾里，满满堆到青豆色河岸的，都是被白人丢去喂鳄鱼的黑人碎骨头，以惩罚他们垂涎白种女人，或只是没有正眼看人。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，但这个可能性，像鬼魂一样高挂在棉花田上方，威胁着大家。

虽然照理说，奴隶制度在我祖母还是小女孩的时代就应该结束了，可我在棉花田工作了快三十年，还是跟个奴隶一样。我有一间不属于我的小屋、两条赊来的工作裤、一头猪，还有一间屋外厕所。我在农场种植、翻土、捡棉花，然后将所有棉花交给拥有土地的主子，没有支票和薪水。我连支票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你可能很难想象，但我就这样从小不点开始，干了无数个季节，一直到那个叫肯尼迪的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。

那些年里，一号公路旁边有条穿越红河郡的载货火车轨道。我每天听着那汽笛声，想象它大声念出我可以去的地方……比如纽约或底特律，我听说有色人种在那边工作是有钱赚的；或是去加州，听说那里几乎人手一沓像煎饼一样的钞票。

有一天，我实在受不了继续穷下去的生活，走到一号公路旁，等火车稍微减速，然后跳了上去。一直到门再次打开我才下车，结果那里刚好是得州沃思堡市。一个不会读书写字，不会算术，除了在棉花田工作以外，什么也不会的黑人到了大城市，他没有太多白人所谓的“就业机会”。所以我最后露宿街头了。

我没打算粉饰：街头会让一个人齜齜。我齜齜，是个游民，犯过法，待过安哥拉监狱，在遇见黛比小姐前又无家可归了多年。关于她，我有句话：她是我认识的最瘦、最多管闲事、最咄咄逼人的女人，不论是黑人或白人。

她那么咄咄逼人，害得我没法不让她知道我的名字叫丹佛——她自己去查了出来。我长时间试着躲开她。但过了一阵子，黛比小姐让我开始讲些我不爱讲的事情，那些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的事，甚至包括那三个拿绳子的年轻人。接下来就让我来告诉你，这里头到底包括了哪些事。

2.



朗

人一辈子，总有些不体面的时刻会永远留在脑海里。

某件发生在 1952 年的事，烧灼在我的脑海里，像长角牛身上的烙印。当时，所有学童都要带尿液样本到学校，让公共卫生人员筛检重大疾病。作为沃思堡市河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，我像其他乖巧的男孩女孩一样，小心翼翼地用塑料杯带着我的尿液样本到学校。但我搞错了，我没交给护士，而是直接拿给波小姐，她是我碰到过的最恶毒最丑陋的老师。

我犯的错误，让她暴怒到让人以为我是直接把尿液样本倒进她桌上的咖啡杯里。为了惩罚我，她像教官一样押着我的双手，叫二年级全体同学到操场，然后拍手叫我们注意。

“同学们，我有事情宣布，”她用粗哑的声音说，老烟枪似的嗓门像大卡车的烂煞车一样刺耳，“朗·霍尔今天不参加休息时间。因为他笨到把他的塑料杯带到教室里，而不是拿到护理室。接下来的三十分钟，他的鼻子

要贴在一个圆圈里。”

然后波小姐拿了一根新的粉笔，在学校红砖墙上画了一个圆圈。圆圈画在我不踮脚站的时候鼻尖上方三英寸之处。我觉得受到了羞辱，悄悄走向前，踮起脚把鼻子贴到墙上。五分钟后，我的眼睛变成了斗鸡眼，只好闭上。因为我想到妈妈警告我不要学斗鸡眼，否则眼睛会永远变成那样。十五分钟后，我的脚趾和小腿严重抽筋，二十分钟后，我的眼泪洗掉波小姐画的圈的下半段。

怀着童年被羞辱的厌恶，我痛恨着波小姐。长大以后，我真希望能寄给她一封信，说我并不笨。但我有很多年没有再想起她，直到1978年6月，某个风和日丽的一天，我坐在我的奔驰敞篷车里，沿着沃思堡市的北大街开。我像个摇滚巨星，大门口的保安挥手叫我开进米肯机场的私人停机坪。这时候我在想，如果能让波小姐、几个前女友——拉娜和丽塔·盖尔巴——还有我1963年霍顿高中毕业班的全体同学排成游行队伍，让他们看看我如何超越了我的中低阶级出身，那应该很完美。回想起来，我很惊讶那天我是怎么开到机场的，因为在从家里到停机坪的那十英里路程中，我一直在欣赏后视镜里的自己。

我把车开到一个站在私人喷气机“猎鹰”前等候的飞行员身边。他身着黑色便裤、熨烫过的白衬衫、油亮的牛仔靴，挥手向我致意。德州机场里的高温让他眯起眼睛。

“早安，霍尔先生，”他提高音量以盖过喷气机的嗡嗡声，“你需要帮忙拿画吗？”

我们小心且一次一件地把三幅乔治亚·欧姬芙的画从奔驰移到“猎鹰”上。这几幅画的总值接近一百万美元。两年前，我把同一批画以五十万美元卖给南得州一个极富有的女人；两幅是欧姬芙最具代表性的花朵，一幅

是骷髅画。当她在她的爱马仕支票簿填好金额、撕下一张私人支票时，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否确定支票可以兑现。

“我希望没问题，亲爱的，”她笑着用她甜腻又拖长的得州音调说，“银行是我开的。”

现在，这位客户要转手这几幅欧姬芙画作。新的买主是个年约五十的优雅女性，她拥有麦迪逊大道上最高级的百货商店之一，可能连沐浴时都戴着珍珠，而她也正要离婚。那天下午她办了个午餐会招待我，并邀请了几个爱好艺术的社交名流朋友，庆祝她最新的斩获。

毫无疑问，她也奉行“最棒的复仇就是过得更好”这套哲学，她把离婚所得到的一笔赡养费（就跟国王绑架赎金一样多）拿来买欧姬芙的画作，买入价格几乎是之前的一倍。她的富有程度让她连付一百万都不必讨价还价。我当然没意见，因为这样下来，我做这笔交易的佣金是十万美元整。

我的客户派“猎鹰”从纽约飞过来接我。登机之后，我在奶油色的皮沙发上伸展四肢，浏览当天的报纸头条。飞行员驾机如箭一般朝跑道前进，先往南起飞，然后轻轻向北。攀升的时候，我往下看着沃思堡市，亿万富翁即将改变这个城市，改变的幅度将不只是表面的：地上的大洞，预告了闪亮的钢筋玻璃大楼即将在此兴建。艺廊、咖啡店、博物馆和高级饭店不久会进驻，连同银行及律师事务所，一起把沃思堡从死气沉沉的小镇变成充满活力的都会中心点。

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，有系统地迁移游民人口，事实上，这是个很明确的目标，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。从三万英尺往下看，我暗地里高兴流浪汉就要被赶到铁路的另一边，因为我厌恶每次去沃思堡俱乐部健身的路上，都会碰到行乞的人。

我的妻子黛比不知道我如此反感，我小心地不让她知道我抱着如暴发

户一样的精英主义。毕竟，九年前我还在卖康宝浓汤，赚取四百五十块的月薪，七年前我才买卖我的第一幅画，而且是悄悄使用（也可说是偷用）黛比的50张福特汽车股票，那还是她从得州基督教大学毕业时父母送她的礼物。

对我而言，这些都是遥远的历史了。我像枚火箭，从罐装浓汤蹿升到投资银行，再到艺术界的顶点。简单来说就是，上帝赐给我两种好眼力：一是对艺术，一是对买卖。但那时的我可不这么想。我的想法是，我把自己从中低阶层乡下男孩，一路引导到“福布斯”前四百名，过那种稀有的生活。

我刚开始涉足艺术交易时，还保留白天的投资银行工作。但在1975年，我卖掉一幅查尔斯·罗素的画，净赚一万美元。买主住在比弗利山，他穿一双白蟒皮镶金鞋头的牛仔靴，镶满钻石的皮带扣大概是盘子那么大……之后我便辞掉银行的工作，在没有退路之下，冒险进入艺术界。

我的冒险得到了报酬。1977年，我卖出我的第一幅“雷诺阿”，然后在欧洲待了一个月，在传统世界的艺术精英圈子里打响了我的名号，证明了我对艺术的眼光。没多久，朗与黛比·霍尔银行户头后面的零就不断增加。我们的收入比不上我们的客户，他们的财产净值在五千万到两亿之间。但我们受邀到他们的社交圈里做客：在加勒比海乘游艇出游，去犹加敦猎飞鸟，在小岛度假胜地或别墅里寒暄交流。

我照单全收，一整个衣柜的阿玛尼西装变成我的“制服”。黛比没有那么迷恋财富。1981年，我从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劳斯莱斯展示厅打电话给她，车商对我手上一幅重要的画有兴趣。

“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刚用画换了什么！”她在我们位于沃思堡的家一接起电话，我立刻这么说。我就坐在那个“什么”里——一辆价值16万美元、火红色的“险路”敞篷车，白色皮革内装，红色滚边以搭配车身。我口齿不清，

又快又急地对着我的卫星电话大声喊。

黛比听完，然后做出宣判：“你敢把那东西带回家就给我试试看！连展示厅都不可以开出去。要是被人看到我坐在那种车里，我会很难堪，更何况是停在我们车道上。”

她刚才真的把劳斯莱斯顶极车系称为“那东西”吗？

“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。”我试图说服她。

“朗，亲爱的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听见她甜蜜的语气让我燃起一丝希望。

“那辆劳斯莱斯有后视镜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往里头看，”她说，“有看见一个摇滚巨星吗？”

“呃，没有……”

“你记住，你是以卖画为生的人。现在你给我下车，把你那霍尔特姆市的屁股坐上飞机回家。”

我只得照办。

黛比不屑劳斯莱斯的那年，我在沃思堡大街新兴的文化特区日舞广场开了一间艺廊，并雇用一位叫派蒂的女士来管理。我们展示了印象派和现代大师的画作——莫奈、毕加索及同期的画家，那些画至少都价值好几十万美元，所以在标价及仓管方面也很小心谨慎，因为还有许多流浪汉还不愿搬去新的住所，也就是东南部公路的底下。他们油腻又臭烘烘，每天都有几个人进来纳凉、取暖或探勘一番。黑人占大多数，而且我坚信他们全都是酒鬼和毒虫，虽然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听他们的故事——我也不在乎。

有一天，一个吸了毒的黑人，穿着肮脏磨破的军队工作服，脚步不稳地走进来。“那幅画卖多少钱？”他含糊地问，并用手指猛戳一幅二十五万

美元的“玛丽·卡萨特”。

我担心他抢劫，试着迎合他而不讲事实。“你口袋里有多少钱？”

“五十块。”他说。

“你五十块给我，就可以带着那幅画走出去。”

“才不呢，先生！我才不花五十块买你那幅画！”

“嗯，这里不是博物馆，我也没收门票，所以如果你不买，我要怎么付租金？”然后我便请他离开。

几天后，他带着一个看起来同样龌龊的伙伴，到我这来砸窗抢劫，拿了一袋现金和一些精工珠宝后便往人行道冲。派蒂按下我们几天前才安装的紧急呼叫钮，我从楼上套房往下跑，上演一出电影里的经典追逐战。抢匪闪进巷子，跳过垃圾桶，我在后面紧追，一边大喊：“拦住他们！我被抢了！”

一开始我全力冲刺，但过了一会儿便慢下来，忽然想到要是我逮到那些流浪汉能怎么办。（我提高音量以弥补渐慢的速度）警察在几条街口外逮到他们时，两个抢匪手上空空如也，十条街口的一路上都是他们掉的二十元钞票和珠宝。

这件事完全加深了我认为流浪汉等于流氓的印象，他们如同一群蚂蚁，等着破坏高尚人士的野餐。那时我完全不知道，上帝如何以他精巧的幽默感，安排了其中一个人来改变我的命运。



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为什么我的名字叫丹佛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只叫我小家伙。好像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，波波——我的爷爷，会把我放在他工作裤前面的口袋里到处走。所以人家才叫我小家伙，我猜。

我妈对我来说很陌生，她只是个年轻女孩，年轻到没办法照顾我。所以她做了该做的事——把我交给波波和大妈妈。在红河郡的庄园和农场就是这么办事的。在有色家庭里，什么组合都有。也许一个成年女性住一间长屋子，采棉花养她的弟弟妹妹，就是个家庭。或者叔叔阿姨抚养姐妹的小孩，那也是个家庭。很多小孩就只有妈妈，没有爸爸。

部分原因是穷。我知道现在这个年代讲这些不中听，但这是事实。往往，男人们在庄园上当佃农，环顾四周，不知道为何自己每年都这么努力在田里工作，却让拥有土地的那个人拿走所有的利润。

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佃农制，让我告诉你那是怎么运作的：那个人拥有土地。然后他给你棉花种子、肥料、骡、几件衣服，以及所有你在一年内